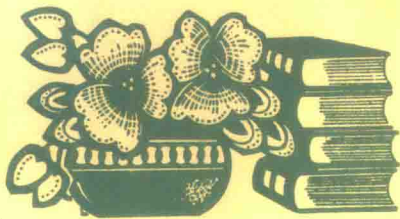


YOUHUAN
ZHENFEN
TENGFEI

忧患·振奋·腾飞

——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

周鸿根 夏东民●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周鸿根 夏东民●编著

忧患·振奋·腾飞

——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忧患·振奋·腾飞

——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

周鸿根 夏东民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18-372-8/D.164

定价: 14.00 元

前 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先进人士救国救民的呐喊。这呐喊，唤醒了全民族的奋起；这呐喊使更多国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苏醒，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大的内在动力。它是中国人民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心潮汇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宝贵精神。

这种精神便是忧患意识的充分表达。

提起忧患意识，有些人认为，讲忧患就是揭露问题，暴露现实，故而不惜以尖刻的态度、辛辣的笔调来指陈现实弊端。更有甚者，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似乎中华即将沉沦，困境和危机尽在彀中。其结果自然不是把人们从忧患中震醒，而是把人们引入失望和不满。显然，这是对忧患意识的曲解。真正的忧患意识是奋进精神、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结合。它需要揭示危机、指陈弊端，但本意是催人奋进。自古以来，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这种忧患之情就会喷涌而出，成为救国救民的强大思想动力。忧患意识发展到革命年代，一批爱国爱民的先进人士，把它与政治参与意识、锐意进取精神和面向工农、面向实际结合起来，成为救亡图存，拯救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

社会发展到当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更是集忧患意识之精粹，承爱国主义之大统，把忧国、忧民之情与世界的历史发展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从而把忧患意识推进到更高更新的阶段，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奋争始于忧患,中华要腾飞也离不开忧患意识。《邓小平文选》字里行间喷涌出来的忧国、忧民、忧党、忧天下之情,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所以,本书以邓小平忧患意识的论述为主题,对邓小平忧患意识的特点、产生的缘由、指陈现实危机的各个方面以及化忧患为动力,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进行一个大致的剖析。

作为一个值得研究与探讨的主题,我们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目 录

前言	(1)
----------	-----

忧患意识的渊源与特点

一、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1)
二、邓小平忧患意识的特点	(18)
忧患意识与放眼世界相结合	(19)
忧患意识与摆脱僵化观念相结合	(25)
忧患意识与乐观情怀的紧密结合	(30)
忧患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紧密结合	(36)

时代·现实·忧患意识的产生

三、贫穷落后的大国	(44)
——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	(44)
中国是个大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极不平衡	(50)
中国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还是个初级阶段的社会 主义	(54)
四、我们自己耽误了二十年	(59)
——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之二	
艰辛探索与经验教训	(59)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我国经济	

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64)
政治上的强国,经济上的弱国	(68)
五、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73)
——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之三	
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	(73)
和平的世界环境和发展的世界大潮,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 挑战	(77)
进则立,不进则退,缓进则败	(85)
六、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丢	(89)
——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之四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90)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94)
只要中国不垮,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99)

忧国·忧民·忧党

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05)
不坚持基本路线,只能是死路一条	(106)
是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	(109)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18)
八、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	(122)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123)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	(125)
要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	(130)
九、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	(139)
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是时代的要求	(140)
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努力避免经济滑坡	(143)
经济发展必须适度,要注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148)

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151)
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	(156)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56)
振兴经济的关键在振兴科技·····	(159)
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163)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66)
十一、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169)
全民的素质关系到“四化”的建设·····	(169)
按照“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	(174)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78)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81)
十二、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183)
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	(184)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87)
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190)
十三、必须狠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6)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196)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1)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	(204)
十四、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209)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210)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214)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218)
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221)

腾飞的起步

十五、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在历史紧要关头,肩负起探索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	(225)
---	--------------

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225)
在历史紧要关头,肩负起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	(228)
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审视中国的现代化·····	(232)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 确立·····	(236)
十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	(240)
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	(240)
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247)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	(254)
十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259)
改革、发展、稳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根本性问题·····	(259)
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	(265)
在实践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266)
十八、跨世纪的宏伟蓝图 ·····	(270)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270)
跨世纪宏伟蓝图的提出·····	(277)
后记 ·····	(288)

忧患意识的渊源与特点

一、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忧患一词产生于战国中期,忧患意识的发展也在这段时期。当然,忧患意识的产生时间可能还要早些,大概在殷末周初。《尚书》这本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中,《周书》部分就散发出浓郁的忧虑情绪^①。台湾知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把忧患意识界定为人类在新旧社会更替时期所具有的“一种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②。他认为华夏民族最初的忧患感发端于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这两个看法基本一致。

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

笔者认为,它是奋进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综合体现。忧患,表明了主体的觉醒,以其细致的观察和深邃的思索,忧国、忧民,思想活跃,精神激亢,充分表达了一种奋进精神。忧患,表明了对社会与环境种种痼疾之忧虑,持有理性的怀疑眼光,以其应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对痼疾予以否定与批判,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与否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定的目的在于创新,批判则是一种创造意识的萌动。破为了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它又

① 上述观点转引自夏乃儒:《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② 参见台湾《孔孟月刊》,1984年第3卷第2期。

蕴含着强劲的创新精神。忧患意识便是这三种精神的综合,是这三种精神融为一体的表现。

因此,忧患意识的主体,大多是一批博学多才、阅历深广、通古达今的睿智学者。他们从宇宙到人生,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审慎的思索,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当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付诸实践时,却又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于是忧国、忧民、忧世、忧人生的情感越发深沉,成为他们血液中的一种活力,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也是一种自我优化、自我超越的思想升华。

忧患意识的价值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环节。一般的说,忧患意识者的忧患,决不是由自我走向自我,而是由自我走向社会。所以,忧患意识又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忧患意识在战国中期得到发展不是偶然的。

战国时期(更广泛地说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相当活跃,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城市,成为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地主经济日益强大,逐渐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经济,社会阶级力量发生分化和新的组合,各国还相继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就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士”这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膨胀。随着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没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阶级的分化,取得食禄的“士”阶层中有不少人下降到平民地位,文化知识逐渐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而且面对各种势力的激烈竞争,各诸侯国统治者不得不“礼贤下士”,收养和聚拢了一批“游说之士”,如在齐国都城的“稷下学宫”就聚集了千数百人。

“士”阶层的膨胀,又引来了学派之争,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当时,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贤能之士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力图以自己的见解寻求“治国、安民、平天下”的良策,并以此取悦各诸侯国的统治者。这时“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蠡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①。于是在他们中间出现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个最主要的学派,后又出现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史称“九流”。学派不同,见解不同,各抒己见,就引起了纷争。当时还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的政治轴心以吸引和控制思想界,思想界的自由度比较高。终于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百花齐放”、“异说竞起”、“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各家学派自由竞争,相互吸收以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繁荣时代。

各派人士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变幻无常的人生世态,使他们的主张和见解,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否定和创新,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忧患意识就在他们的论述和主张中喷涌而出。这批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思考、争鸣、交锋,使得忧患意识喷之愈涌,泄之愈烈,成为那个时代一股强劲的心潮。

当时,最大、最有影响的学派,首推儒家。其主要代表是孔子(孔丘)和孟子(孟轲)。他们的忧患意识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孔丘到孟轲都提倡“忧道”。孔子为了行道救世,怀着宏大的志向和抱负,周游列国陈述政见,抨击时弊,规劝诸侯,“思以其道易天下”,反映出他们“弘道”救民的忧患意识,以及为这种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为此,他们还主张不断反躬自省,注重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弘道”、“卫

① 《汉书·艺文志》。

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发展到孟轲，他身逢战乱不堪，民不聊生，各诸侯国纷求才俊之士的时代。依孟子的口才，他完全可以像张仪那样，身佩六国相印，利用时局，以求宦达，然而他以宏道为己任，依然周游列国，以求道行。并主张与民同忧同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这虽然是对统治者的劝说，但强调君主与民同忧同乐，毕竟含有较高的民主性的精华。

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老子（老聃）和庄子（庄周）。他们的处世态度是消极的，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中地位日益下降的中下层势力。他们“忧世”，对世事悲观失望，他们厌世、避世、逸世，主张“无为而治”。然而，从他们对统治者惨无人道迫害百姓的无情揭露中，仍能看出其内心之愤慨，忧世之激情。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②，猛烈地鞭笞了当时的统治者。庄子也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滥杀百姓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了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忧世之情。但他主张进入一种“无思无虑”、“无生无死”的神秘的精神世界中去求解脱，这就是消极的了。

墨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为墨子（墨翟）。他们代表了一个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社会阶层，墨家学说显露出强烈的平民色彩，充满着小生产者的原始平等观念。他们揭露了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③，忧民思想比较突出。认为贵族的侈奢，造成国家贫穷，“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统治者的征战“又使病死者、战死者不可胜数”^④，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愿

① 《孟子·梁惠王下》。

② 见《老子》第75章、74章。

③ 《墨子·兼爱》。

④ 《墨子·节用上》。

望,表达了下层人民的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还认为王公贵族的忧患与民之忧患是对立的,但又主张加以调和。

法家学派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主要代表是韩非和商鞅。他们主张加强君权,实行法制。所以,毫不掩饰地把“忧天下”与“忧君主”直接等同起来。他们明确提出“不必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认为一切措施都要有利于新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世异而事异”,“事异而备变”^①。如果时代变了,人们却墨守成规,则势必为人耻笑。在他们“忧天下”的内容中,“忧民”因素虽不多,但忧国、忧世,重视改革,锐意创新的积极因素是不少的。

上述各家的忧患意识虽各有其特点,但“忧国”、“忧民”、“忧世”、“忧天下”是共同的,而且忧患意识的内涵也是极其丰蕴的。是观察与思考的升华,是理智与情感的融通,是理想与现实的砥砺。构成了先秦时期的一种时代精神,为以后忧患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秦汉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从司马迁到柳宗元,从黄宗羲到孙中山,忧患意识犹如山岭之绵亘不绝。到明末清初之际,由于社会的极大动乱,新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出现,反映早期市民阶层利益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等人脱颖而出。他们面对社会的沉沦、朝政的黑暗,尤其是清军入关后和汉族地主统治阶级相勾结,对人民,特别是对参加抗清斗争的人民的残暴迫害和杀戮,更激起了忧国、忧民之情,愤然起而抗争。他们几乎都参加过抗清的武装斗争,通过总结实践斗争的教训,反思“天崩地解”的缘故,从而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喊。

鸦片战争时期,面对外敌的入侵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一批开明思想家,把忧国、忧民、忧天下之情提

^① 《韩非子·五蠹》。

高到新的高度,魏源提出了“以夷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对付外敌入侵和学习外国之长结合起来,开始了中国人从封建文化之外去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新阶段,这对忧患意识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超越。随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继承了上述忧患意识的合理内核,并加以充实发展,使它更接近于时代,接近于现实,接近于人民。

20世纪初,广大的爱国志士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社会沉沦,忧患意识更是喷涌而出。忧国忧民与救国救民的行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西方列强诸国已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之间在全世界范围的称雄争霸愈演愈烈。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却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开始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封建统治者(包括民国初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除了贪婪、腐败、向人民横征暴敛外,还出卖主权,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取得“太上皇”(外国主子)的庇护而苟延残喘。这就使得堂堂中华处于分裂破碎的飘摇之境,巍巍神州被推上了生死存亡的悬崖峭壁。当时的中国,正如毛泽东所描绘的:是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①。社会的改造、国家的进步、民族的生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成了一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先进分子的思想主流。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辛亥革命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随之有了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

于战争,顾不上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实力,有了一定的增长。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孪生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成长与壮大,工人斗争的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五四”运动中,他们带着明显的阶级主体意识,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动,必将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思想意识的萌动产生深刻影响。

此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也开始崛起。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一批大学先后创办,一批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从而出现了一批教师、作家、新闻工作者、记者等以知识为职业的新型知识分子。特别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提倡“废科举,办新学”,这就在制度上堵塞了“由士而仕”的读书作官之途,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以功名利禄为唯一标准的择业意向。他们开始以自己的知识谋求职业,为社会服务,从而获得了以创造文化为职业标记的独立社会身份,赢得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士大夫便历史性地转化为近代的新型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目睹统治者的腐败、社会沉沦、人民疾苦,因此,忧国、忧民之心搏动更烈,忧世、忧天下之情愤之更甚,他们义愤满腔,壮怀激烈,将忧患意识发展、升华到前人所不曾有过的新的高度。

首先,他们将忧患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动人们从悲天悯人的状态走到现实政治斗争的激烈的环境中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会在学术与政治这两条道上进行艰难的自我选择。有些人崇尚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竭力将自己禁锢在学术研究的小天地里,视政治为肮脏的渊藪,尽量使自己超乎在一切政见之上。然而,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掀起的阵阵狂澜,使之无从回避现实。国颓民危,痛苦地折磨着一切怀有爱国爱

民之心的人们。所以,把这种忧国忧民之情引入到实际的政治斗争,把研究新思潮和现实政治斗争完全结合起来,就成为忧患意识在 20 世纪初的一个显著特点。

胡乔木在纪念李大钊诞生 10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匹夫有责”正是政治参与意识的充分表达。李大钊从“党私”、“省私”、“匪氛”,“以上三端,百思恐不获免。……曷有以解我忧”^①,发展到以极其愤怒而沉痛的心情,投入当时沸腾的政治斗争。在日本留学时,他就积极投入反日反袁(世凯)的斗争,回国后不久,来到《新青年》编辑部,投入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并以其锐利之笔,猛烈地抨击当时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人民的觉悟,鼓舞群众的斗志,还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率先讴歌了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以天下为己任,把忧患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结合起来的杰出典范。

为学术而学术原本属于太平盛世的蓬莱仙境,而在大厦将倾之际,生灵涂炭之时,就更属幻想。有些人明知“超然治学”是一种对现实的逃脱,将为国人所不耻,但又不愿尝试可怕的政治风险,于是吹奏起“学术救国”的论调,表明自己既未脱离现实,又不介入政治,将自己安插在脱离政治火线的“安全地带”。于是,“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论调相继出笼。当然也有不少受上述观点影响的人,是真诚地相信它的功效的。但,不论是真诚拥护也好,还是借此获得短暂的心理平衡也好,在残酷的现实和强烈的政治风暴冲击下,只要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最后,势必打破这短暂的心理平衡。而一些真诚地相

^① 转引自《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 4 页。